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几个问题

新经济呼唤理论创新

编者按:2016 年 6 月 18 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与《经济学家周报》在北京国学馆共同举办了以信息时代经济学理论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学会前任理事长杨培芳教授、《经济学家》主编管益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禹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本期发表部分学者的主题发言,以飨读者。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经济形态正在从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他又说“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人们需要做出的是一种社会决策,不等于个人决策的总和。正如每一辆汽车都聚在一起,个人决策加在一起肯定是一场恶梦”。斯蒂格利茨提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的标准竞争模型不能反映市场经济,很多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确保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未来指引方向”。

《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作者里夫金提出了一个产权之问:“互联网的所有者是谁”?他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并不多,大部分的资金来自数百万的消费者和纳税人。每一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互联网又不属于任何人”。有人提出上网“提速降费”的问题,本身就是矛盾。一方面我们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将电信资费完全市场化,政府刚刚下发文件说完全放开电信资费,但是没多久国务院总理就又提出来要提速降费。有人解释说是国务院总理代表市场对价格提出的要求。现在上网费降了多少,有的降了百分之三十几,有的降了百分之二十几。都是按照信息流量来算的,有时候会突然收到短信说赠送你多少 G 的免费流量,你一用就超,因为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或者只有什么时间用才能用,或者叫做什么定向流量。反正你信了他们就吃亏上当,把零边际成本的新经济当做稀缺资源的传统经济卖给消费者,完全扭曲了新经济的根本特征。

■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

因为现在的时代很浮躁,多数人不怎么关注理论,可是现在遇到许多新问题都需要从根本理论上寻找出路。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新经济这个词比较热。近日在发改委讨论新经济与制度创新,我提出来制度创新更需要新经济理论的支撑,因为新经济和老经济不一样,工业时代我们跟随美国和欧洲就行了,信息时代我国在 IT 技术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已经走到前面,到了无人区。跟随发展比较容易,引领发展就容易迷茫。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研究新经济理论有七八年了,今天这次讨论应该是更加深入的一次。我的致辞就到这里,下面还想再讲三句话。

现代经济学已经失灵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西方经济学已死”,比较刺激,惹很多人不高兴。现在许多境外学者都在反思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似乎只有我们国内对西方经济学还是顶礼膜拜,甚至当作圣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下滑,环境污染,灾害频发,贫富差距拉大,西方经济学开不出有效的药方。诺奖经济学大师布坎南说,现代经济学已经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斯蒂格利茨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试图证明经济个人主义是有效的,但是“一旦引入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以后,帕累托效率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问题出在两个半世纪以来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悖论,叫做“利己之心可结利他之果”,认为每个人都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来有人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自私,只有贪婪自私才能激发人们去创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亚当·斯密的年代,为了消除封建势力,提倡经济个人主义是进步的,但是延续到工业时代后期问题就来了。借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一句话,“地球何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张五常也在反思经济学为何失败?他说自私可以使人发展,也可能使人类毁灭!科斯最近也开始惊叹“经济学已经坏掉了”!他说“物理学已经超越牛顿,生物学也已经超越达尔文,可是经济学尚没有超越亚当斯密”。现在欧美有很多大学的学生抗议经济学理论无用,要求全面修改经济学教材。

新经济学派正在兴起

70 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到了“无人区”。我先是看到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讲他们产业发展,已经顶天花板了。华为现在是世界老三,他要十年之内超过苹果和三星,它要当老大;这是企业之间竞争问题,而整个产业、行业向前走已经无参照物了。我们的经济学也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无人区”了。现在不管是科斯、张五常,还是斯蒂格利茨,都感觉到金融,经济等等危机根子在经济理论危机中。

■ 管益忻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教授《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这有几个概念需要探讨一下,首当其冲的是关于“价值”。

关于价值、价值观这可能要分几个层次来阐明,其中,有概括一切价值的价值即人文价值观,也有经济领域的经济价值,艺术领域的艺术价值,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街上摆摊的摊主也有他的价值(追求)。而就我们今天的经济理论“危机”来说,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必须而又如何划清作为覆盖一切价值的价值—人文价值观同作为子系统的经济价值的界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经济价值还是要放在一般人文价值之后。

话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往的——主要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经济学里的——经济学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价值观,这就是犯“二”了,因为没有人文价值导向。多年来的“一切向钱看”倾向,“唯 GDP 论”,把“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当作绝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等等观念都与这个理念相关。

再一个问题,成为整个“全球村”主流经济学之最主流立论基础之一的“资源稀缺”论,把“资源稀缺”当作绝对真理、绝对不容置疑的信条,且久而久之,人们也绝对地不再去反躬自问是否为真理了。这种绝对的统治了大大小小经济学家,以及各种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源稀缺”观念,实际上是只知其一不知二,只见物质资源,不闻信息资源。什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宽带、物联网等等(其总称为 ICT)一概被“屏蔽掉了”,至于文化创意产业之内涵价值导向,创意、设计等,就更不见踪影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十分荒谬的。

在今天,ICT 已经成为主体性的经济资源了。今年三月,在与江苏洽谈合作的爱立信董事长雷夫演讲中提到,他们要“助力南京及整个江苏的 ICT 产业发展”,提议“让我们拥抱第五次技术革命,它就是 ICT 时代。”而中国的马云则在强调 ICT 之重要性时说,我不要石油,要(更为重要的)大数据。

在这里有必要对信息这一概念从其作为经济学范畴,从经济资源视角上给出—初步的定义和阐述。

其一,信息是非物质的物质,即非传统物质观的“物质资源”,是从传统物质观中“剥离”出来的物质资源。它早已不单是什么可以被他人感知的、客观上存在的物质了,而是用以加工的,也可以加工别的物质的经济资源(的物质)。

其二,信息是无形的经济资源,是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如果说)大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物质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资源了——轻型、无型的经济资源。事实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大数据库。

其三,信息是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类生产以及其他各种活动的经济、物质资源。一切活动必须得有信息。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而自身又成为价值观的载体,成为有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等等的载体。

其四,它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而又可以无限复制、无限边际延伸的资源。这种容量之无限性、质地之无限性以至于使得经营运作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正在为人类产业、经济、文化一切经营运作活动,生产、生活方式开辟更为美好,也更加复杂、曲折的未来。

其五,信息加工(加工信息)是工业化第三代资源配置中的主体资源。

人类有史以来工业化之资源配置中大致上有三种基本形态,或者说工业化就是三种加工,从绝对意义上说这三种加工、三种资源配置是同时存在,不可截然分开的。而从相对主导侧面来说,其历史上排序则为先是加工物质为主,继之加工信息为主,最后阶段加工价值观主导。我们现在正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之际,美国等这些发达经济主体部分已开始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了。美国是透支经济的,这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经济背书。帝国主义从透支经济开始,它现在搞的 TPP 实际上是早在“广场协议”——压榨盟友日本——到今天的变胎和翻版。但在客观上,它的确又是在为 ICT 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的经济;是开辟新经济、新产业发展道路的领航资源配置样本。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以数据经济领航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探讨,就是要探讨我们东方特色的 I-ICT-M 化体系,它应当是这个世界有东西方两体系、两大生态模式之一。

必须建立全新的经济学体系,必须建立东方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

这个体系之最核心构架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以西方经济学为时代参照性,这是我们应当确立之根本得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框架;那种数典忘祖,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实践,奉为经典教材的作法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的很广,问题很多。在这里,作为举例,本人拟紧密结合实践谈一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尤其是“活劳动”和配置效率问题。下面的展开叙述将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效率问题,同时,紧密联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是生产活动与投资、效率配置问题。

前文已讲到了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也是劳动效率,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活劳动”观点应予大大向前发展。不光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个别工人的“活劳动”就是活劳动,其实“活劳动”存在于生产、产业、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各个分支及其各个节点为上。认清“活劳动”的重要性,认清“活劳动”的配置效率及其意义和作用,在今天,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nd 创意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和作用。

这儿要解开的一个“扣子”是当年马克思讲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这一点,在实践上早已突破了;早已承认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创造功能,而“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率”了。就是说,创出的新产品中“活劳动”要素、“生产资料”要素都参与价值创造了。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坚持的马克思原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含有人的价值追求的“活劳动”之创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特定功能 and 作用,“生产资料”本身是不具备的。而新产品中也含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是搭了“活劳动的便车”转移过来的。讲全要素生产率不讲“活劳动”的功能、作用是不对的。生产资料本身没有活劳动,因为那其中没有“人”。

在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活劳动”之多层次存在和作用发挥。作业岗位上的工人“活劳动”,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企业资源配置中企业家的“活劳动”;再上一层则是产业集群的管理层的“活劳动”,甚至是国家层面发改委各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活劳动”。我们必须大大拓展马克思“活劳动”理论观点。对劳动价值论重新定议,这就要向前发展。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书里面披露了很多的剩余价值散论,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资本论”。

以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即自管仲以来的经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杰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济学理论为主体,直到今天的中国,响应者寥寥无几,更难以称之为主体。但要真正建立起符合马克思称之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典型代表的真正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大厦,又必须在这方面下大气力。在中国古代先贤中诸子百家里只有管子是经济理论之集大成者。

后世之商鞅变法,桑弘羊与盐铁论、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无不自管子以降。而今天更要注重循着管仲以来理论源流来研究中国经济,这特别要研究中国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发展史。我们过去说明朝以后才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这是错误的。《管子》的里面就已经有资本,而且是工商资本,这太重要了。也有股份制,有官股,有民股,管仲所在的那个时代就有。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中国的产业资本发展史。前面说的 I-ICT-M、I 是价值观、创意,文化创意产业,ICT 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的总称,M 是讲的物质。现在美国也需要这样。我去年 6 月 22 号在哈佛同库伯对话,提到了奥巴马的“再制造”。我说那不是“再制造”,而是“新制造”。我说你的苹果、微软等等都是新制造, he 说是高科技,我说不是高科技,高科技不是产业。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不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基本框架,这已被质疑,程碧波的研究就认为可能是魁奈的“经济表”是真正的框架,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框架是“管子”及其之后的理论,这也是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起码应先彻底地摒弃那种对我们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虚无主义倾向。有一些洋面包吃得太多的人有点不明白,他们根本没有去认真深入探讨过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当然,这倒不是要评说学问高低。

现在看来,西方经济学之危机,首要的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西方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几近于诡辩,例如它说的外部性往往就是诡辩术。1+1>2,问题多出在“+”号上,这是亟需我们深入探索的。西方的经济学大厦几近于垮塌了,前文说过,最要紧的“资源稀缺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的。不仅如此,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价值观资源,这三大资源构成的资源,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何来资源危机?

在“经济人”假设方面,看西方经济学亦是问题严重的。如关于个人主义、局部与整体关系问题。

先顺便讲一下“普惠”和“分享”的问题。叫“普惠”还是叫“分享”这问题不大,意思差不多,但也是有区别的。西方讲“分享”比较多,强调了个人。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讲向共产主义过渡要讲个人利益和个人兴趣,这是讲根本制度、规则,不能单单靠星期六义务劳动,纯粹做贡献。我们这同咱们说的自私利己不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很“纠结”,咱们不是说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讲民生,讲改革要使广大群众(有)获得感,得实惠,不就是要使每个群众要有合理的个人利益吗?辩证法强调二点论,但也讲重点论。刚才碧波引了管子的话否定了“个人至上”的观念,以家为乡,乡不可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里。这也是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每个人按照个人设计看来是合理的方案行事,整合起来那必定是一场灾难。

最后特别应指出的一点是世界经济有东西两大不同模式,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模式的代表。这是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苏利奇回信中讲的——她要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看法。马克思写了四个草稿,最后回信说,你们俄国、中国、印度等大国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欧洲是不同的。其主要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公共物品由中央掌握。刚才碧波讲了中国的“国计学”,可见直到咱们现在还在讲的国计民生之国计,就是那时流传到今天。马克思说法国农民是一筐土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商品经济。就是刚才程碧波讲的,其实这在古代恰好说的是西方国家,而我们往往简单地说中国自始就是农耕社会,并不正确。近来有一种立论,讲城市化、房地产、经济危机三角恶性矛盾。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城市化和工业化颠倒了,本来工业化是产业内容,城市化是空白形态,我们把城市化放在第一位,城市化放在第一位,实践中就把房地产占在制高点,房地产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再出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有史以来最主要的经济核心就是制造业。微软和苹果是第二制造,新制造,主要在 ICT 上,最典型的就是一部苹果手机,665 美元,咱们组装 15 美元,其他的 650 美元都是加工信息的。